

王
进 / 著

郭沫若

与
现代中国哲学论争



贵州人民出版社

郭沫若与现代中国哲学论争

王 进 著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沫若与现代中国哲学论争/王进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 12

ISBN 7-221-07265-5

I. 郭... II. 王... III. 郭沫若(1892~1978)—哲学思想—研究 IV. 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0527 号

责任编辑 顾庆荣

封面设计 唐锡璋

郭沫若与现代中国哲学论争

王 进 著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88 千字

印 张 8.25

版 别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7-221-07265-5/B·214

定 价 18.00 元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郭沫若是业绩卓越、足以传之不朽的文学家、历史和考古学家，而首先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古今中外的大历史家必定同时是思想家、哲学家。郭沫若就是其中之一。

——刘大年：《郭沫若与哲学》

郭沫若的功劳就是用他的著作、行动来体现历史唯物主义。

——周 扬：《在郭沫若研究学术
座谈会上的讲话》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郭沫若与东西文化的论争	(13)
一、论争的由来和发展	(13)
二、郭沫若对“东方文化派”的批判	(22)
三、郭沫若对“整理国故”的评价及对国学 研究方法论的阐述	(33)
四、对郭沫若在这场论争中的思想状况和 局限性的分析	(44)
第二章 郭沫若与国家主义派的论争	(54)
一、国家主义的出现及郭沫若参加论争前 的理论准备	(54)
二、国家主义派的政治纲领及郭沫若对它的批判	(61)
三、郭沫若对国家主义派唯心史观的批判	(73)
四、郭沫若在这场论争中的特点及局限性	(90)
第三章 郭沫若与中国社会史的论争	(97)
一、论战发生的原因	(97)

二、论争前郭沫若对唯物史观的潜心研究	(105)
三、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著作对 唯心史观的批判	(112)
四、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历史 作用及局限性	(131)
第四章 郭沫若与中国文化问题的论争	(142)
一、论争的出现及其实质	(142)
二、郭沫若对“中国本位”论和“全盘西化”论 的批判	(151)
三、郭沫若对唯物史观的捍卫及对近代中国 文化落后原因的分析	(163)
四、郭沫若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探讨	(174)
第五章 郭沫若对复古主义的批判	(182)
一、抗日战争时期的复古主义思潮	(182)
二、郭沫若批判复古主义思潮的斗争	(191)
三、郭沫若在批判复古主义思潮中对 唯物史观的阐述	(201)
四、郭沫若对主观主义的批判	(212)
第六章 郭沫若对“中间路线”的批判	(217)
一、“中间路线”的由来和发展	(218)
二、郭沫若对“中间路线”政治观点的批判	(227)
三、郭沫若对“中间路线”唯心史观本质的揭露	(241)
后 记	(254)

导 言

郭沫若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像他那样才华横溢、博大精深,在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和甲骨文研究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许多领域都有着重要建树的人,在中外文化史上都是罕见的。对于这样一位文化巨人,我们以往的研究,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都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对于郭沫若哲学思想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1983年5月召开的“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曾经提出了“广泛、深入地开拓郭沫若研究的领域”的问题。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郭沫若研究领域不宽的问题并没有多大改变。本人进行《郭沫若与现代中国哲学论争》的研究,就是试图在开拓郭沫若研究领域方面做点工作。

郭沫若虽然没有系统的哲学著作,但却有丰富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在谈到“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新军的历史功绩时曾经指出:“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

……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①作为这支文化新军的一员主将,郭沫若以其渊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敏锐的思路和勇于开拓的精神,驰骋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不仅在文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披荆斩棘、开疆辟土的贡献,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捍卫等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郭沫若是中国较早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无产阶级翻译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积极传播者。早在1930年5月5日,即马克思诞辰一百一十二周年之际,他就以“最善的努力”、“忠实于原文”和努力地“求其消化”^②的精神,翻译了马克思阐述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翌年,他又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哲学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1936年上半年,他还先后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的片段和马克思的《黑格尔式思辨之秘密》。在他自己的著作中,还引证和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资本论》、《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反杜林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698页。

② 郭沫若:《〈经济学方法论〉译者附白》,见《社会科学讲座》,1930年6月出版。

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谈谈辩证法问题》，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践论》、《矛盾论》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无产阶级的哲学》等重要哲学著作。

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翻译和介绍，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这是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郭沫若又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文化史和哲学史的思想家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忠实实践者。他研究历史，“主要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①。他研究中国文学的发展，是为了“由文学的角度”窥察得“辩证的历史观”^②。他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离开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去研究思想问题，“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③而坚持从研究

① 郭沫若：《海涛集》，《沫若文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12页。

② 郭沫若：《创造的十年续编》，《沫若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56页。

③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社会的经济基础入手,先弄清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再研究与之相适应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制度,最后才分析在这种经济、政治制度下出现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道德观念,从而第一次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

郭沫若虽然没有专门的纯粹哲学思想方面的论著,但却有大量的关于哲学史、思想史方面的论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于他的全部政治活动、文艺创作和学术活动之中,与他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浑然一体。正如周扬所说:“郭沫若的功劳就是用他的著作、行动来体现历史唯物主义。”^①这是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一重要贡献。

郭沫若是一位剑笔并用进行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积极参加了同各种错误、反动哲学思潮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勇敢捍卫者。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兼而为之。他不仅几度“投笔请缨”,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洪流,而且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始终“鸡鸣不已”,用他战斗的笔,同各种错误、反动的哲学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的不少著作,就是与这些哲学思潮斗争的产物。

“五四”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怀着憧憬的

^① 周扬:《在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专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郭沫若，就参加了同“东方文化派”的论争。他批判了“东方文化派”和“国故派”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的形而上学态度，并对对待西方科学文化的原则和研究国学的的方法论做出了许多正确的论述。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郭沫若自觉地和共产党人一道，积极参加了批判“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他以刚刚接受和初步掌握的马克思主义为武器，较为深刻地批判了“国家主义派”在阶级、国家和社会革命等方面散布的种种谬论，有力地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国家和社会革命的理论。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身居海外的郭沫若，仍然时刻关注着国内的思想理论斗争。他先后参加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争和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论争。在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争中，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奥秘，有力地粉碎了“国情特殊论”者对中国历史的歪曲和阻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图谋。在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论争中，他又进一步批判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中国本位论”和“全盘西化论”，有力地批判了中国文化史和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的唯心史观，并对近代中国文化落后的原因和文化发展的规律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又积极参与了对复古主义思潮的批判。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同历史、文艺、哲学、教育等领域的复古主义思潮进行了

坚决的斗争,并对“英雄史观”、“文化史观”、“历史循环论”等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中国共产党开展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的时候,作为党外人士的郭沫若,也专门写了《驴、猪、鹿、马》和《鼠乎?象乎?》等历史小品,在国统区积极配合党的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郭沫若参加了批判“自由主义者”所谓“中间路线”的斗争。他同共产党人一道,深刻地批判了“中间路线”“调和国共”、“兼亲美苏”的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批判了“自由主义”者鼓吹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学说。

参加批判各种错误、反动的哲学思潮,捍卫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一个重要贡献。《郭沫若与现代中国哲学论争》,就是对他的这种贡献的系统总结。

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早已引起了国内外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1945年8月9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莫斯科为来访的郭沫若举行的送别宴会上,到会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就“高度评价了郭沫若在历史、哲学、文学和文艺翻译等方面的贡献”^①。1978年8月郭沫若逝世以后,邓小平在为他致的《悼词》中,也充

^① 见龚济民等:《郭沫若年谱》(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9页。

分肯定了郭沫若在哲学方面“有重要建树”。我们研究郭沫若,就必须研究郭沫若的哲学思想,研究他在宣传、运用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以确立郭沫若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地位。辽宁大学哲学系的同仁们把郭沫若的《论中德文化书》、《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借问胡适》、《历史的路只有一条》等十多篇文献收入《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为确立郭沫若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地位做出了可贵的努力。我们研究《郭沫若与现代中国哲学论争》,也是试图在这方面做点工作。

还必须指出的是,郭沫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种错误、反动的哲学思潮进行的六次论争,不仅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且还对进行理论论争的原则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对于我们进行学术批判、开展思想论争提供了极为有益的经验。

这些经验主要有:

第一,要在真理面前低头,不愿在权威面前拜倒。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郭沫若就对那种在学术论争中重名气而轻真理的风气极为不满。他说:“在沉寂的文艺界中,偶尔有所论争,而第三者的批评大都是目有名人而无真理。甲与乙论辩,甲有名而乙无名时,则甲胜而乙负。甲乙均属名人时,则胜负之分又在其名之大小。论辩借新闻杂志以发表,而主笔政者衡文亦大都以‘名’之

分铜而定其斤两。高名之甲随处有自由发表之特权,而低名之乙则不遭抹杀即遭窜改。”与此相反,郭沫若鲜明地提出了“我们只愿在真理的圣坛之前低头,不愿在一切物质的权威之前拜倒”的口号。对于当时学术界在论及同时代名人时,总要加上一些表示敬意的称谓的做法,他深不以为然,主张对时贤“略去一切形式上的敬语”而直呼其名。他还奉劝以名气压人的胡适:“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留美学生的资格来压人,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的!要想把人压倒,只好请‘真理’先生出来,只好请‘正义’先生出来!”^①

在历次哲学论争中,郭沫若都始终坚持了只服从真理而不盲目服从权威的精神。没有真理,虽是名人、权威他也敢于挑战;有真理,虽无名小辈他也乐于服从。这就是郭沫若对待学术论争的科学态度。正因为有了这种科学态度,才使他既有抓住真理、所向披靡的理论勇气,又有虚怀若谷、博采众长的求实精神,在论争中不断地克服论敌,发展自己。

第二,“批评家应该是公平的审判官,不是刽子手”^②。这是郭沫若在历次论争中始终坚持的一条重要

① 郭沫若:《讨论注释运动及其他》,见《创造季刊》2卷1期。

② 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03页。

原则。他认为,被批评者的作品,是人家劳绩的结晶。“对于别人的劳绩”,“是应该相当地尊重,而不可一概抹杀的。”^①所以,对于批评,应该持慎重的态度,要在充分研究别人作品的基础上谨慎地进行。“没有充分的研究,通盘的衡量,适度的表达,批评实在是不容许轻易写作的。”

与此同时,批评又是相当复杂的。批评家要真正成为“公平的审判官”,对批评就必须“衡轻重,争缓急,别错综,权利害。”同样出现的一个错误,有的是“友人而偶犯错误”,有的是“敌人而貌为和善”。因此,要区别情况,分别对待。同样是批评,不同的方式会带来不同的结果。要注意权衡,“两利相权,取其大者;两害相权,取其小者。”

此外,批评是郑重的。批评家要真正成为“公平的审判官”,就必须“化除个人的意气,把批评导引向原则性的、建设性的、真正战斗性的水准上去。”郭沫若以美国前总统华盛顿小时候玩斧头,走进园子里碰到任何树木都乱砍,结果把他父亲喜欢的樱桃树也砍断了的故事,告诫人们,对待错误的东西,“无条件的‘一团和气’固然不好,无条件的‘一团火气’更加糟糕。它不仅会糟蹋了批评,而且会糟蹋了朋友,糟蹋了自己,糟蹋了一切。”因此,他明确提出,在批评中,“还得遵守着一条禁令,便是

① 郭沫若:《借问胡适》,见《中华公论》创刊号。

不许夹杂丝毫个人的意气。”^①

“批评家应该是公平的审判官,不是刽子手”。这是十分精粹之言。它生动而深刻地指出了进行批评的目的,体现了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它明确地告诉人们,正确的批评是“评判”,而不是“扼杀”。因此,只能批评其所非,肯定其所是。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批判,对“国家主义”、“读经”、“整理国故”等等的批评,都是坚持这个原则的典范。

第三,学术论争应该是“公平无私的相互批判”^②。郭沫若认为“偶尔的错误原来是人人所不能免的”,“在初学者是不能免,便在博学通儒也是不能免”。因此,“被人指摘了错误绝不是可耻的事情,指摘了别人的错误也并不是狂妄的举动。”^③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应该是平等的。既要允许批评,也要允许被批评者的反批评,提倡“公平无私的相互批判”。

学术论争既然是“论争”,就既要允许“论”,也要允许“争”。论争双方都既是批评者,又是被批评者。特别是在社会变革这种“严烈的批评时代”,“新旧是非之争到了白热的焦点”,为了使批评发达,就“必须强调接受

① 以上均见郭沫若:《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741~744页。

② 郭沫若:《中国战时的文学与艺术》,1942年5月28日《新华日报》。

③ 郭沫若:《讨论注释运动及其他》,见《创造季刊》2卷1期。

批评的雅量”^①。他强调：“我们要成功一位批评家，首先就需要自己有尊重批评、接受批评的诚意。”^②而在这方面，郭沫若同样堪称楷模。他既毫不容情地对各种错误思想展开批判，又对别人的反批判给予高度的重视。在论争中，他总是把自己摆在同被批判者平等的地位，从来不“以一个宣教师的态度企图传播任何教条”^③。郭沫若非常欢迎反批判，善于从反批判中吸取营养来纠正自己的偏颇、完善自己的认识。这是郭沫若的一个极为宝贵的品格，也是他能够成为一代文化巨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四，是否有利于人民，是衡量批评的标准。郭沫若指出：“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今天我们做人的标准，也是做批评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明是非，分敌友，诚爱憎，慎褒贬，这都是原则上的问题。”^④这就是说，在学术论争中，明辨是非、分清敌友、确立爱憎、选择褒贬，都要以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为准则。有利于人民者则是“是”、是“友”，则爱之、褒之；有害于人民的则是

① 郭沫若：《迎接批评时代的一个基本问题》，香港《群众》周刊2卷3期。

② 郭沫若：《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744页。

③ 郭沫若：《〈青铜时代〉后记》，《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1页。

④ 郭沫若：《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743页。